



创于1897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第三卷)

乔洪武 等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第三卷)

乔洪武 等著



201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乔洪武等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ISBN 978 - 7 - 100 - 12815 - 5

I . ①西… II . ①乔… III . ①经济伦理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 ①B82 - 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96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乔洪武 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815 - 5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4 3/4

定价:268.00 元

本书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攻关项目“西方经济
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特此鸣谢!

目 录

第四部分 现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下)

第二十四章 发展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3
第一节 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	7
一、经济增长的可取之处	8
二、贪得无厌的代价	11
三、有道德的发展	14
第二节 冈纳·缪尔达尔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	17
一、发展必须尊重欠发达国家的实际	18
二、现代化理想:欠发达国家发展的价值观前提	22
三、平等发展的伦理诉求	24
第三节 弗朗索瓦·佩鲁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	28
一、传统经济学的道德退化	29
二、以“进化论”取代“机械论”的人本发展观	32
三、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价值尺度	35
第四节 德尼·吉莱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	37
一、作为发展的“手段之手段”的道德哲学	37
二、发展的三个价值目标	40
三、发展的道德战略与战略原则	43
第五节 赫尔曼·戴利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	48
一、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之一:足够而不是最大化	50
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之二:公正分配	52
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之三:保持财富的效率	5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六节 迈克尔·托达罗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	55
一、发展经济学的价值期待与价值前提	56
二、发展的三个重要价值标准	57
三、反贫困的伦理	59
第七节 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	62
一、经济增长的道德目的	62
二、良善循环和恶意循环	65
三、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道德意义	67
四、经济增长的环境忧虑	69
第八节 简要评价	72
第二十五章 数理伦理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89
第一节 经济伦理数理研究方法的发展轨迹	90
第二节 宾默尔的经济伦理思想	100
一、移情与移情偏好	101
二、生存博弈与道德博弈	103
三、自然演化的正义	107
四、对斯密道德情感的继承	110
第三节 阿克斯罗德和萨利的经济伦理思想	113
一、罗伯特·阿克斯罗德的合作理论	114
二、萨利的合作理论	121
第四节 金迪斯和鲍尔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125
第五节 克里斯蒂娜·比切利的经济伦理思想	137
第六节 简要评价	148
第二十六章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剥削与正义的思想	155
第一节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156
一、柯亨的经济伦理思想	157
二、罗默的经济伦理思想	167
三、埃尔斯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177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的伦理论争	182
一、艾伦·伍德论剥削与正义	182
二、麦金太尔论剥削的非正义性	184
三、布尔扎克论剥削的非正义性	187
四、埃塞尔论剥削的非正义性	190
五、德马蒂诺论剥削的非正义性	193
第三节 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196
一、霍耐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197
二、南茜·弗雷泽的经济伦理思想	204
第四节 简要评价	217
第二十七章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与城市的思想	228
第一节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229
一、奥康纳的经济伦理思想	229
二、福斯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237
三、高兹的经济伦理思想	246
第二节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260
一、列斐伏尔的经济伦理思想	260
二、索亚的经济伦理思想	265
三、彼得·马尔库塞的经济伦理思想	272
四、大卫·哈维的经济伦理思想	276
第三节 简要评价	290
第二十八章 当代日本的经济伦理思想	301
第一节 近代日本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回溯	303
一、明治维新至一战前的近代日本经济伦理思想	303
二、两战期间日本经济伦理思想	307
第二节 当代日本的经济伦理思想	313
一、日本自由至上主义学派经济伦理思想	313
二、日本平等主义学派经济伦理思想	337

三、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349
第三节 简要评价	369
第二十九章 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新发展	382
第一节 救市政策的伦理之争	382
一、对短期救市手段的伦理取向之争	385
二、对长期救市对策的伦理评价之争	393
第二节 危机背后的伦理论争	401
一、引发危机的直接外因的伦理争论	401
二、引发危机的主要内因的伦理争论	414
三、危机后果的伦理争论	428
第三节 简要评价	437

第四部分

现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下)

第二十四章 发展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回顾西方经济学说史,经济发展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甚至更早。经济发展思想的萌芽见诸许多早期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包括杨小凯在内的部分学者甚至将古典经济学看作是“古典发展经济学”,这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和动力,主张通过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自由,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或发展)。因此可以说,经济发展思想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同步出现的。这些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经济增长问题,对经济增长的论述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而还不能称为经济发展理论。

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观察发达国家成功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形成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产生与发展;第二次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产生与发展;第三次是新剑桥增长模型的产生与发展;第四次则是新增长模型的产生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发展演化的同时,一门以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也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

阿瑟·刘易斯认为,在穆勒 1848 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①一书中讨论了经济发展问题之后,直到 1954 年他的《经济增长理论》^②一书出

①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金镝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版,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不过事实上,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发展经济学的萌芽思想已经出现。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威廉·吕彼克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①,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②,尤金·斯塔利的《世界经济发展》^③,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④以及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⑤等。这些著作虽然关注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但在论证方面不是很系统,也不是很全面,只是发展经济学的思想萌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发展经济学才作为一门对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建立起来,其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简·丁伯根(1969 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库兹涅茨(1971 年)、冈纳·缪尔达尔(1974 年)、西奥多·舒尔茨(1979 年)、阿瑟·刘易斯(1979 年)、罗伯特·索洛(1987 年)、道格拉斯·诺思(1993 年)、阿玛蒂亚·森(1998 年)。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获奖表明,发展经济学理论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认可。随着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已经超出其研究界限,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融合。

在发展经济学的演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受到不同经济思想流派的影响,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发展观和发展政策主张。对发展经济学学派的划分,经济学界形成了不同的主张。例如,霍利斯·钱纳里(1975 年)根据方法论将发展经济学流派分为:新古典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⑥。金德尔伯格和赫克里(1986 年)则将其划分为:新古典主义、激进主

^① [法]威廉·吕彼克:“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1938 年 7 月号。

^② Rosenstein-Rodan, P. N., “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The Economic Journal* , 53, 1943, pp.202—211.

^③ Staley, 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 Montreal: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44.

^④ Mandelbaum, K.,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Backward Area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55, No. 4, 1947, pp. 385—386.

^⑤ Chang, Pei-kang,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⑥ Chenery, H. B., “A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75, 65(2), pp. 310—316.

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①。他们的划分方法受到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接受,但是由于这一划分方法提出的时间较早,未能反映 20 世纪 80 年中后期发展经济学的新变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培刚先生则提出将发展经济学理论划分为: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激进的和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盛行的新制度主义^②。迈克尔·托达罗和史密斯则在其最新版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发展理论划分为四个学派:经济增长和线性阶段增长理论学派;结构变革理论;国际依附革命理论以及新古典、自由市场理论。该书还同时指出,在发展经济学的演化历程中,线性增长理论在第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特色是“三唯”,即“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论”和“唯计划化论”。“唯资本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较为充裕,自然资源的供给条件对经济增长不起决定作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制约要素是物质资本,发展中国家所匮乏的也正是物质资本。因此,发展中国家应特别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当时,为“唯资本论”提供理论依据的有“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它们均认为投资率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若资本循环速度永远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就无法跳出贫困恶性循环及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唯工业化论”认为,发达国家的一大特征是工业化水平高。发展中国家谋求工业化不仅具有追赶发达国家的一般意义,还具有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特殊意义。首先,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率,而新增的人口无法为农业部门吸收,工业化是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其次,工业化可以替代进口,减少外汇短缺的约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第三,工业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同时还会带来可观的外在经济性:既保护了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工业都属于幼稚工业),又通过工业现代化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发

^①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张欣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22 页。

^② 张培刚 张建华:《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序言第 1 页。

展模型”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充分的论证。“唯计划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市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不完全,市场信号不准确,不能反映商品或成品的真实成本。同时,对于企图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调节会引起在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和投资项目上社会评价和私人评价上的差异,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速度。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投资主体都只强调自身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重视整个社会集体所处的环境和潜在危险,不愿意为了集体的最优生存方式与发展目标作出任何自我约束。所以,从社会整体来讲,投资决策不能由相互矛盾的利益集团或个人来作出,必须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荷兰的简·丁伯根(1903—1994)的研究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提供了政策工具。^①

到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发展经济学没有很好地经受住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检验,曾经蔚为壮观的发展经济学开始从高潮走下坡路。1983年,原籍印度的英国经济学家狄帕克·拉尔出版《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全面反思了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他明确宣称:“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消亡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②从此,发展经济学转入到第二阶段,结构变革理论和国际依附革命理论基本上取代了线性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它又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流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着重强调自由市场和开放经济的有益作用。在此之后,从属这些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提出新增长理论。^③本章选取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不同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分别进行研究。

^① 乔洪武:“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与中国的历史验证和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英]狄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刘沪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2页。

^③ [美]迈克尔·P.托达罗,斯蒂芬·史密斯:《发展经济学》,聂巧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74—75页。

第一节 阿瑟·刘易斯的经济 发展伦理思想

威廉·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1991),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刘易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他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广泛的科学辩论,由此形成了对刘易斯模型的一系列补充研究。刘易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对政策问题的研究,另外一个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动力的研究。他在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1954年发表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①。这篇文章成为他最具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两部门模型”,即“二元经济发展理论”。1955年,刘易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一书问世。《经济增长理论》是一部有关经济增长的巨著,书中探讨了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因素。在刘易斯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人的行为选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人的行为选择则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如资本、劳动、储蓄和投资等,同时也深受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价值观、职业观、消费方式、财产权利、历史传统、社会和制度的因素等。刘易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一共发表了70余篇论文,10余篇政府报告,另外还出版了《经济计划原理》^②、《经济增长面面观》^③、《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④等11部著作。1979年,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① Lewis,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② Lewis,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Routledge, 1954.

^③ Lewis, A., *Aspects of Tropical Trade 1883—1965*, Stockholm: Almquist and Wiksell, 1969.

^④ Lewis, A.,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刘易斯与西奥多·舒尔茨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一位拿到诺贝尔奖非和平奖项的黑人。

一、经济增长的可取之处

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的理论》中明确了他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产出的增长，而非分配。虽然产出的增长不一定带来收入的增长，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他只关心产出。此外，他关心的经济增长问题也不包括消费。产出与消费并非总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储蓄和政府活动也可能影响产出和消费，但他只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增长问题。刘易斯还强调，他在此书中研究的也不是产出的测算，“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老框框所下的‘经济’定义的‘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①因为经济意义上的产出的增加并不一定使人变得更加幸福。综上所述，刘易斯研究的是纯粹的产出的增长及其影响因素，而不关心产出的分配，即个人财富的增长问题，亦不关心产出的消费问题。他实际上将“经济”产出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画上了等号，同时也明确了他的财富观和幸福观——财富的增长源于产出的增长，但是财富的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的增加。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追求经济增长呢？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有何可取之处呢？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附录“经济增长是否可取？”一文中，刘易斯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做出了如下解释：“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得。幸福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但情况不一定如此。”^②他认为，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态度是根据他们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利弊，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代价的不同估计。刘易斯认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因此，

^①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514页。

无论经济增长或财富的增加是增加幸福还是减少幸福都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①首先,经济增长使得人们能够降低饥荒、瘟疫和传染病的危害,延长了寿命。其次,经济增长使人们收入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减少,因此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第三,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和空闲时间增加的前提下,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服务,享受更多的精神食粮,创造更多的文化和艺术财富。此外,经济增长还提高了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使人类能够享受更多的人道主义。最后,刘易斯还指出了经济增长对于维持政治稳定、防止社会内乱的作用,“在当今的民主时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处在这样的阶段:除非迅速增加人均产量以使资源更接近于欲望,否则严重内乱不可避免。”但他同时也承认,经济增长反过来也可能导致社会的阶级、种族和宗教冲突加剧。所以,“不能说经济增长一定会改善政治关系。”^②

尽管经济增长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增加了财富或增加了幸福,而在于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自由,然而不同社会或国家为追求经济增长做出努力的意愿和所付出的努力的不同决定了他们获得这种自由在程度上的差异。在刘易斯看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不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有社会学的问题。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主体的个人行为选择有着极大的关系:“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③其中,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是经济主体的节约。尽管不同国家财富上的差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源禀赋的影响,但是有些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在发展程度上却差异巨大。刘易斯将其原因归结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差异”^④。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导言中,刘易斯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三个近因:“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点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点的理论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

^①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15页。

^② 同上书,第462页。

^③ 同上书,第3页。

^④ 同上。